

倪嗣冲与北洋军阀

NISICHONG YU BEIYANGJUNFA

李良玉 吴修申◎主编



黄山书社

倪嗣冲与北洋军阀

NISICHONG YU BEIYANGJUNFA

李良玉 吴修申◎主编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倪嗣冲与北洋军阀/李良玉, 吴修申主编.—合肥:黄山书社, 2012.12

ISBN 978-7-5461-3326-3

I. ①倪… II. ①李… ②吴… III. ①倪嗣冲(1868~1924)—人物研究—文集 ②北洋军阀史—文集 IV. ①K827=5②K258.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5285 号

倪嗣冲与北洋军阀

李良玉 吴修申 主编

出版人:任耕耘

策划编辑:汤吟菲

责任编辑:朱莉莉 江 汇

装帧设计:尹 晨

责任印制:李 磊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apg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邮编:23007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0551-3533762 3533768

印 制: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0551-3983516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4.5

字数:390 千

版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978-7-5461-3326-3

定价: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在“倪嗣冲与北洋军阀”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吴海涛/001
放宽视野,深入拓展北洋史研究	
——在“倪嗣冲与北洋军阀”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彭南生/003
重绘“民国前半程”历史轨迹	马 勇/006
《函电集》中的倪嗣冲	李学通/019
北洋人物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华腾/026
试论倪嗣冲与安徽省议会的关系	
——以 1916—1919 年盐斤加价案为例	李良玉 郝 芹/035
1912—1920 年安徽政局述论	陈 雷/047
倪、袁之谊与民初安徽政局	刘家富/061
民初安徽政局与都督人选	郭从杰/073
倪嗣冲政治人格基本特征管窥	赵炎才/084
倪嗣冲与蚌埠:关于区域性经济中心形成中政治因素的思考	马陵合/106
倪嗣冲与近代皖省水陆交通格局的变迁	孙 昉/115
五四运动期间芜湖日商事件浅析	王勇则/123

倪氏家族与金城银行述论	葛培林/143
津门联姻、人脉与倪氏财团实业	金彭育/151
1935 年裕元纺织有限公司停工清理始末	黑广菊/160
倪嗣冲主政期间安徽旱涝灾害的赈济与治理	欧阳跃峰 张 艳/166
浅论倪嗣冲民生观念及实践	龚光明/173
论 1917—1918 年倪嗣冲两次派兵入湘原因	李英铨 郭坤杰/188
倪嗣冲攻颍之役诸问题探略	王 涛/195
倪嗣冲督皖时期兵变及舆论反映	郭坤杰/204
倪嗣冲与安武军之兴亡	李英铨 关 伟/209
倪嗣冲与白朗军入皖	郭从杰 郝天豪/227
试论倪嗣冲的尊孔读经思想	孙军红/235
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孔教运动”	于文善/239
阜阳地方志中的倪嗣冲形象	吴修申 卢 燕/245
颍西倪氏家族居住地变迁历程与原因探究	李 强 李庆宇/256
对倪嗣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苏全有 何亚丽/266
北洋人物研究的理论视角	
——兼评《倪嗣冲年谱》	梁家贵/280
倪嗣冲与 1916 年中日借款	邵武军/289
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思路与史料	
——兼谈倪嗣冲研究	汪锋华/295
民初安徽长淮水上警察厅探析	邢光辉/305
“军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兵灾救护	池子华/313
北洋政府奖励实业政策之结构分析	李 玉/325
“三重证据法”及其在确认历史建筑身份中的运用	
——以天津北洋人物旧居为重点的方法与个案探讨	王振良/349

军阀时期长江巡阅使、苏皖赣巡阅使与安徽军区制论略	刘迪香/357
民国初年社会精神刍议	敖 堃/371
“倪嗣冲与北洋军阀”学术研讨会综述	郭从杰/378
后记.....	/384

在“倪嗣冲与北洋军阀”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吴海涛

(2011年11月19日)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老师们、同学们：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由我校社会发展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共同举办的“倪嗣冲与北洋军阀”学术研讨会在这里开幕了，这是我校学术活动中的一件大事，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此，请允许我代表阜阳师范学院全校两万四千多名师生，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最热烈地欢迎，对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地祝贺！

阜阳市地处皖西北，属于黄淮大平原，人口一千多万，是安徽省人口最多的地级市。这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管子、老子、庄子，政治家、文学家曹操、曹丕、曹植，“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苏轼、曾巩等众多思想、政治精英，赋予了这片土地厚重的文化底蕴。阜阳物产资源丰富、区域交通便捷，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美好，正逐步成长为辐射周边地区的中心城市。

作为皖西北地区唯一一所省属普通本科高校，阜阳师范学院有55年的办学历史，现有两个校区，占地1400余亩，设有16个学院，47个本科专业，拥有省级以上科研机构7个，在职教职员工1100余人，在校学生2.3万人。近几年来，我校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支持皖北发展的倾斜政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狠抓内涵建设，强化精心管理，以优秀的成绩接受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成功新增为国家级立项建设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学校各项事业在量的扩张中实现了质的提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

我校社会发展学院前身是1987年创建的历史系。目前，该学院设有历史学、人力资源管理、地理科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等4个本科专业，拥有专任教

师 31 人,其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9 人,博士 10 人,在读博士 3 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960 人。

社会发展学院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将学科建设与地方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学科优势与群体优势,积极主动地参与地方历史与文化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出版了《淮北的盛衰:成因的历史考察》、《阜阳通史》、《阜阳历史文化概观》等著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2008 年年底,社会发展学院又成立了近代安徽历史名人研究所,着眼于近代安徽历史名人特别是皖北历史人物的研究,力争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近几年来,该所研究人员在安徽督军倪嗣冲等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出版了《倪嗣冲年谱》、《倪嗣冲函电集》,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20 余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译室这次与我校合办“倪嗣冲与北洋军阀”学术研讨会,是对我校建设与发展的关注与支持,也必将对我校历史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和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相信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对推动倪嗣冲及其他北洋人物研究的深入,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各位专家、各位学者,阜阳师范学院是一所发展中的高校,特别需要得到科研机构、兄弟院校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厚爱,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对我校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等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最后,祝愿各位专家学者在阜阳期间工作顺利、生活愉快!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作者吴海涛,阜阳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安徽阜阳,236037)

放宽视野,深入拓展北洋史研究

——在“倪嗣冲与北洋军阀”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彭南生

尊敬的吴海涛院长、李良玉院长、各位专家:

上午好!感谢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的盛情邀请,使我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向各位北洋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讨教!我是北洋史研究的外行,近些年来,集中精力研讨“五四”后的上海商人团体——马路商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的中下层商人组织,它参与、介入政治的程度很深,与北洋军阀人物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使我深感北洋时期历史的复杂性。我认为,北洋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有三个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一,辩证地看待北洋军阀和北洋统治时代的历史。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北洋军阀统治的16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段黑暗的历史时期,但不可否认,它也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三个这样好坏两面形成尖锐对比的时代,一是战国时代(或称先秦、晚周时代),二是魏晋时代(或称魏晋南北朝),三是五四时代(或称清末民初)。^①五四时代恰好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除了以新文化运动为载体的思想解放外,这个时期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时代。过去我们常常认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事实上,一战结束后的经济依然在缓慢发展。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经济的发展多归因于一战的发生所造成的客观市场环境带来的有利性,新文化运动则归结为晚清民初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

^① 参看唐翼明2011年11月9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讲坛上的报告:《魏晋人文精神及其对当代文化发展的意义》。

的自然产物,即物质—制度—精神的历史运动。相反,对北洋政权和军阀的作用提得较少。不应否认,北京政府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措施,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企业发展的政策法令,地方军阀们即便为了争战也需要在自己的地盘上维护经济的发展,以保证其粮草所需。当然,中央权威的式微,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从而为学术自由、思想争鸣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北洋军阀中的个体,也不能以“天下乌鸦”观念等量齐观,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利益、性格、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有死心塌地投靠帝国主义的军阀,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上,甚至表现在政治理念上。以吴佩孚为例,1920年6月,吴佩孚通电全国,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的主张,8月1日,拟定国民大会大纲八条,并以工、农、商、学各会作为国民大会会员选举的基本单位,“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选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不必以本会为限;如无工商等会,宁缺毋滥”。国民大会的宗旨是“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订选举方法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公决,他方不得籍口破坏”。^①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商人参与政治的心理需求。吴佩孚集矛盾于一身,他是一个军阀,但又有一定的爱国情结,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五四运动中德先生、赛先生的影响,“他不同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所拟国民大会八条大纲,除限期(三个月内开会)和临时性任务外(各省、县成立总事务所、事务所),又同孙中山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从形式上到精神上立意大致相同;他并非要真正依靠工农商学各界,但却强调国家政治和议会制度应由各界代表行使权力,以解决一党一派所操纵的专制制度”。^②其实吴氏有关国民大会的主张,虚中有实,真中有假,他针对军人乱政的现状倡导国民大会的理由是客观存在的,他欲借国民大会除掉皖系专权的动机也是不能否认的,他是否想借国民大会的召开实现“主权在民”、“国民自决”的价值理性,是需要进行认真研究的。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展开研究。

第二,立体地、多角度地研究北洋军阀。在北洋人物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大军阀,也要探讨军阀中的中、下层人物;不仅要注重北洋时代的军阀,也应重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军阀的去向与活动;不仅要重视叱咤风云时代的军阀,也

① 《东方杂志》第17卷,第17号,第133页。

② 郭剑林:《吴佩孚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要研究军阀的晚年;不仅要研究军阀发动、参与的战争,还要探讨军阀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慈善等活动中的表现,甚至于军阀的家庭生活,也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第三,加大资料整理与出版的力度。仅二档馆就藏有有关北洋军阀的档案资料 10 万件,各地方档案馆有关北洋时期的档案资料更为丰富,这些档案资料急待挖掘、整理、出版。在这方面,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的李良玉教授及其同事们作出了很大努力,先后整理出版了《倪嗣冲年谱》、《倪嗣冲函电集》,注重外文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克服自说自话的状况。

最后,感谢会议组织者的辛勤劳动!预祝本次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作者彭南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重绘“民国前半程”历史轨迹

马 勇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2012年是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这两个百年前的重大事变,将近代中国历史分成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前面是两千年帝制时代,后面则是现代民主政治共和时期。当然,此后的共和道路并不平坦。刚刚成立不久的共和国面临着多次复辟威胁,中国虽然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坚守住了共和原则,但是到了1928年,中华民国还是发生了一次巨大转变,孙中山、蒋介石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势如破竹,长驱北伐,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放弃抵抗,中国复归统一,但政权性质与先前几乎完全不同了。如何评估1928年之前的中华民国史,过去的言说,不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都将这一时间段看做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即便中性表述,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或“北洋时期”。如果从大历史视角观察,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的正统。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尊重。淡化乃至最终放弃党派立场和意识形态视角,重新检讨“民国前半程”政治得失,或许应该引起近代史学界注意。

一、孙中山的失落与失望

如果历史主义看待中华民国在大陆三十八年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中华民国政府,还有蒋介石及国民党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

我们过去很长时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中华民国成立了，民族主义实现了，剩下的就是好好建设民主政治、实现普遍民权，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质。这不就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理想吗，为什么孙中山总是不满意？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

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满洲人创建的这个“殖民政府”，“驱逐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农民领袖，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实现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通过“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各派革命势力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1905年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定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

根据这些方针谋略，革命党在推翻清廷后构建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的意思。

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

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中国革命大功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孙中山不能认同民众的自觉、自醒和自主,反而认为他们这些先知先觉者就是天生为民众行使权力,他们是民众的公仆,没有私心,没有私利。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只是在现实政治层面忽略了人性的弱点和人类的劣根性。

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海外流亡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毕竟承担着革命的责任,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

其实,如果仔细研究1905年之后的中国政治,还应该坦率地承认清廷尤其是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的自私、狭隘和心胸狭窄。

清廷经过1895年的维新,1898年的变政,1901年的新政,至1905年终于通过日俄战争觉醒到应该走向宪政,实行君主立宪。这无疑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然而就在这个历史关节点上,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没有把握住历史机遇,没有大度地宣布大赦天下,全民和解,尽量多地引导各种政治力量一起参与宪政大业。清廷嫉恨几年前康有为武装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的政变企图,不愿赦免康有为和他那些追随者;因为痛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过去十年打打杀杀,不断在各地制造暴动,因而也不愿赦免这些革命者。相反,清廷却借着预备立宪的机会,想方设法分化瓦解革命党人,想法鼓励革命党人离开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宪政改革。这种做法当然是对的,只是这种做法必然会使孙中山那些无法回归体制的少数革命党人越来越孤立,越来越愤怒,只能破釜沉舟孤注一掷,革命到底。

在清廷刻意打压下,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确实陷入低谷,孙中山等少数革命党人确实一度失望。他们没有办法回归主流社会,没有办法参与政治变革。他们只能被迫等待。所以后来发生的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坚持不懈奋斗得来的,不如说是被迫等来的机会。

孙中山不愧为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他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政治信条。为了实现推翻清廷重建民主政治架构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逐鞑虏”等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外部压力,但孙中山从原先政治立场上逐步调整,逐步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这里有革命的机会主义,有对形势的灵活判断,只是这个机会主义和灵活判断为民国政治埋下了冲突的种子。此后几十年政治纷争,差不多都能从南京临时政府政治架构中找到萌芽或因子。

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尤其是那个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南京临时政府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他们放弃了不太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没有刻意强调按照孙中山过去十七年设计的政治路线图往前走,南京临时政府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因而南京临时政府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成立,能够获得那些老牌立宪党人的普遍支持。假如没有东南立宪党人的支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可能性肯定会打下一个很大的折扣。

二、袁世凯的大度与大意

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

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

场历练中,使袁世凯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可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

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

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

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五权宪法、三民主义,以及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不仅具有一套完整的宪政理想,而且亲身参与了晚清十年宪政改革实践。在袁世凯的政治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其实也是一种宪政体制,这种体制所实行的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更不存在重回启发民众,先军政,再训政,慢慢培养民众的宪政习惯,慢慢将宪政民主的权利还给人民等问题。

确实,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宪政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君主立宪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

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如此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

然而,宋教仁血案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口实和理由,使民国政治方向特别是孙中山的政治方向在这里发生根本变化,孙中山不再相信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不再相信他和国民党有办法在议会中通过和平的方式重新夺取权力,反而借宋教仁案向袁世凯公开发难,以武装起义去推翻一个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从此,民国政治扰攘不宁,孙中山的政治信誉,国民党的政治信誉,都在这个过程中严重受损。

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孙中山在民国元年那样赞美袁世凯,现在突然翻脸,借机发难,誓不两立。宋教仁案确实在国民党在革命党阵营中引起巨大反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主张借着这个机会起兵反袁。孙中山为什么一意孤行如此执著?这里面是否还有我们不太知道,而且孙中山也不愿明言,或者不便明言的心曲呢?

其实,如果仔细排比民国元年相关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孙中山离开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位置真的不是自愿,更不存在让位。因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其实达成了一项谅解,即由于清廷内部的守旧派根本不愿让步,所以应该在南方成立一个革命性的政府,用过激变革促动清廷让步,因此由立宪党人支持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就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概念——“临时政府”——刻意强调其“临时性”。

说起来比较尴尬,但也必须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只是立宪党人大牌局中的一个棋子,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由于自身力量不足,也乐于充当这样的棋子。然而到了后来,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越做越像,孙中山也确实想到不让位,想到北伐,或者南北分治。孙中山在这个过程中有过一些外交活动,确实期待通过外交承认使南京临时政府成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政府。然而,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力量根本无法与立宪党人相抗衡。南京临时政府所谓财政困难,所谓政令不出南京城,说到底都是立宪党人在其间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们知道,立宪党人均来自有产阶级,有的人即便做不到富可敌国,但养活孙中山主持的临时政府,应该不费力气。事实上,南京临时政府在那么短的时间